

一所好的大学,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,这就是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。千人一面、千篇一律,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。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。

——温家宝



只要国家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,行政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大学校长陈骏



在学术研究、招生等方面应该让学校有充分自主权,这样大学才能有自己独立的灵魂,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。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东南大学校长易红



学校的行政管理事务,占日常事务的60%~70%。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



当了官儿,自然就有“公事”,也就难以集中精力去从事科学研究。

——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闵乃本

快报记者专访教育界两会代表委员,谈教育去行政化

摘掉官帽,大学能否“一身轻”

□快报特派记者
郑春平 陈英 孙兰兰
北京 报道

两会召开,民意沸腾,众多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被代表、委员们带到了两会。其中最为教育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是:中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?建设一流大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,需要热情,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。两会召开前夕公布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,提出“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,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”。民间议论的“大学去行政化,大学摘官帽”,成了国家意志,这使得大学自主办学成为可能,也为建设一流大学创造必要条件。很自然,这也引起了两会教育界代表、委员的热议。

行政事务占了大学校长大半工作

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”钱学森之问近来一直是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的关注热点。

“要出杰出人才,要出大师,必须要有好的学术氛围。现在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了!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,以前的学者都是一辈子做学问,现在有些人是啥都想做,既教书、搞科研,还当官、经商,精力非常旺盛。在清华,想找一些好教授当处长,很难,他们想专门搞学术;也有人抢着当,但大家都不同意。”

教授们可以选择当不当处长、院长,那么大学校长们怎么办?戴上了这顶“官帽”,行政事务与学术事务该如何兼顾?

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以自己为例,介绍了作为一名“大学校长”的日常事务分配比重:

一是学校的行政管理事务,占日常事务的60%~70%。杨震说,毕竟全校有两三万名教职工、学生,这么多人吃喝拉撒都在学校,校长都得管,堪称一个“小社会”。而这也是中国高校与国外不同的地方,不单纯是人才培养、学术创新,还承担着众多的管理职能。

二是学术研究、教学,占日常事务20%。杨震表示,中国的大学校长大多数是做学术出身,保持对相关科研动态的准确把握,才能在学术领域享有发言权。但这的确会占用一些行政管理事务的时间。

三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、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。

四是参与社会团体、学术机构等社会活动等。

杨震说,参政议政、社会团体活动等上述两个方面共占日常事务的10%~20%。但并非所有高校校长都有参政议政的事务,这与他是全国人大代表、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有关;而担任社会团体与学术机构的相关职务和事务,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学术领域内的动态,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学校的影响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,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

中在学校的管理上,至于校外的职务,“行政上要求做什么,我尽量去做好,但是不会用心去做,精力会牵扯一些,不过没那么严重。”现在他也还有一些科研任务,还在带研究生,也有实验室,“学校管理责任太大,不集中精力去做的话,很难做好。有一点余力的话,再去做科研。”

“官帽”是被戴上去的

“学校管理,本身肯定有一套行政化体系,这是毫无疑问。但行政化应该是为学术服务,而不代表某种权力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东南大学校长易红说,其实,中国高校的行政化,主要问题不在内部,而在外部,是“被行政化”。

易红的名片很简洁,名字后面写的是“校长”,上方的醒目位置更突出的是“教授、博士”。他更看重的是后两个头衔。“在学校里,我们系里的老师,以及我带的学生,一直都是称我为‘易老师’,我喜欢他们这样称呼。”而对于他的另一个身份——“副部级干部”,他并不喜欢别人提起,但是又很无奈:没有这顶“官帽”,光是靠着教授、博士、大学老师,甚至校长的身份,与外界打交道时,很多事情没办法。“大学被迫行政化,让我们也很累。”

在分析高校为何行政化时,陈骏认为,高校其实是“被行政化”的,这与整个国家的管理模式有关,从中央到地方,都是统一步伐、统一行动,要“听指挥”,高校也不可能游离于这样一个大体系之外,所以必须要服从从上到下的指挥,和其他部门的步调一致,这样一来,就造成了高校行政化现象。

“整个社会,就是一个大的行政体系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表示,中国高校的行政化,不是高校自主形成的,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“大社会”有关,从行政到经济体制都如此。首先,国内高校有部属、省属之分,相应的就产生了级别之分。其次,“就连大学里的工资,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的。”例如,从党委书记、校长到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等,考虑的是行政级别,副部级、厅级、副厅级,而不是教授、副教授……这跟政府部门是一样的。到高校任职,政府部门首先做的,

也是对行政级别,为其“定级”,“包括退休了能享受什么待遇,全都是按照这个来的。”

“发工资”要定级,高校办学资金多少,也跟“级别”有关。绝大多数高校负责人坦言,通常行政级别越高,“官帽”越大,争取和筹集办学资金越容易,否则很难搞到“资源”。

对应部属、省属之分,高校的办学资金也主要分为“国拨”(国家拨款)、“省拨”(省级拨款)。杨震介绍,即便是“国拨”,标准也有所不同,例如“985高校”、“211高校”等。其中“985高校”拨款最高,不同的学校拨款标准相差很大。杨震笑称:“外部社会、政府部门首先就把大学分成了‘三六九等’。”

此外,在筹集外部资金时,学校的“级别”及其相应的校长、院长级别,也能对筹集资金起到影响和“帮助”。“行政化过多必然影响学业,但是没有行政头衔,也会对资源获取产生影响,很多教授要争个‘头衔’也正是这个原因。”

中国学者的“学而优则仕”情结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闵乃本则从另一个层面,剖析了高校行政化的原因。

自古,中国文人就有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观念,认为只有走上仕途,才是正道。哪怕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,也为自己在官场上的不得意郁郁寡欢,无法超脱。“骨子里受‘官本位’文化的影响,已经根深蒂固。”闵乃本说,这是行政化的历史根源。无论是高校还是机关,“官”就代表一定的地位和权力,专家、科研人员在达到一定的学术层次后,也不能“免俗”地想谋个一官半职。当了官儿,自然就有“公事”,也就难以集中精力去从事科学研究,科研项目往往依靠研究生去做,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就无从谈起。

一些数据也显示,现在不仅“学而优则仕”,更可以“仕而优则学”。

日前两院新增选的院士名单中,中科院新增的35名院士,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管理人员,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,85%以上是现任官员,工程院60岁以

下新当选的院士都是带“长”的人物。有人研究后发现,中国工程院院士的“官员度”平均官职略高于厅局级副职,而实际上,一旦成为院士即享受“副部级”待遇。在闵乃本看来,正因有这些深层次的根源,高校去行政化不是一个命令就能解决的问题,要逐步地去破解。

希望自主办学,愿意摘“官帽”

去除行政化,首先也就意味着,这些大学校长的“官帽”要被摘除。

采访中,诸位校长都表示,很愿意摘掉这些“副部级”“正厅级”的帽子。

“高校内部的人士希望去行政化,就是去掉高校和政府关系的行政化,给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,这样高校才能独立地思考,自由地表达。”陈骏认为,行政化最大的问题在于,国家用管理行政的方式来管理学校,而学校缺少办学的自主权,这是行政化给学校带来的最大问题。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果提高的话,行政化没有太大的危害。“只要国家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,行政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”至于行政化与高校管理人员的工资挂钩,这不是主要问题,去行政化后也完全可以解决。

“我们都是搞学术出身的,这些官位级别对我们来说,没什么意思。”易红说,大学的外部行政化,已经牵扯了他的很多精力。

“现在,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太细了。学科设置、专业设置、招生计划,什么都要干预。”比方说,规定今年给你的指标是600个博士、2000个硕士,你想多招点博士,少招点硕士,那是绝对不允许的,必须按指标来。而这些数字又是怎么确定的呢?主要是历史形成的。现实的情况却是在不断变化。

专业设置,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的建立,这些也被“行政化”了。教育部设立非常多的专项,你想拿到资金获得经费支持,想申报成功,就得按这个目录要求来。

“大学需要接受政府的管理,但更多的应该是宏观管理,在学术研究、招生等方面应该让学校有充分的自主权,这样,大学才能

有自己独立的灵魂,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。”易红说,希望摘了“官帽”,能让大学校长将精力放在学校上,而不用事事去“迎合”上面的要求。

对于内部的行政化倾向,“确实有一些教授愿意当处长,承担行政职务。这倒也无可厚非。我们同样有很多教授,只愿自己静心做学术,不愿意涉及所谓的‘官场’。”易红说,“因为不存在什么利益差别,在东大,我们的教授工资级别以及岗位津贴,是和处长一样;副教授相当于副处长。”“我听说有些学校是完全按行政化级别来拿钱的,行政权力太重,弱化学术权力。那肯定不行。学校的基础是学术,潜藏教学、专业研究的学者们连收入都没保障了,那还谈什么创建一流大学?”

采访中,虽然大家认为,大学应该“摘掉官帽”,但也有些担心。

“高校与地方交流的时候,有行政级别好说话些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林业大学校长余世袁担心的是:一旦学校没了行政级别,出去以后,会不会有些事情不太好办。毕竟整个社会是个讲究行政级别的大环境。

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,以前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,退休后,他接受了南方科技大学的聘书,重新出山的原因很简单:这所大学的理念就是去行政化。没有级别,他已经颇有体会: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亲自管你,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时,由于是副部级待遇,安徽省教育厅不大管中国科大,有事他们就直接找副省长对话;没了这个官帽,他在深圳参加大会,让主办方也有些为难;第一次,他被排在当地一所职业院校的后面,第二次,又将他排在了这所职校的前面。这种待遇,让朱清时觉得“很有趣”。“英国的剑桥大学也没有级别,但无论在哪里,它都是受尊重的。”

“光是高校摘帽还不够,外部环境也需要同步改变。现在国家提出‘大学要取消行政级别’的方向是对的,但具体怎么操作,还需要细则。”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认为,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法定该授予的还是要授予,不能干涉。但是,学校也要自觉接受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指导。